

旧邦新命：近代中国的再生型博物馆

From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o Temple of the Muses:
Regenerative Museums in Modern China

史 勇

Shi Yong

(甘肃省文物局, 兰州, 730030)

(Gan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anzhou, 730030)

内容提要: 依托古建筑创设的再生型博物馆是近代中国博物馆的重要类型, 始于清末维新, 终于抗战胜利前夕, 其数量占近代中国公共博物馆巅峰期总量的三分之二。以再生型博物馆为载体, 不仅使其所赋存的古建筑获得新生, 亦推动了博物馆这一舶来品的本土化进程。再生型博物馆自身虽有短板, 发展亦受外部因素影响, 但相对于近代中国其他公共文化机构, 其具有共和象征、古建筑保护、文化产业三重独特价值蕴涵。

关键词: 古建筑 再生利用 近代中国 博物馆史

Abstract: Regenerative museums built on ancient buildings are an important type of modern Chinese museums, beginning with the refor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nding on the eve of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ir number accounts for two-third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modern Chinese public museums during their peak period. Using regenerative museums as a carrier not only brings new life to the ancient buildings they contain, but also promotes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museums as an exotic product. Although regenerative museums have their own weakness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is also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compared to other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modern China, they have three unique value implications: the symbol of the republic,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Ancient building; recycling; modern China; museum history

依托古建筑设立博物馆, 是中外早期博物馆必经的历史阶段, 也是博物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现象, 此类博物馆通常被定义为再生型博物馆^[1]。近代中国之博物馆与古建筑再生利用有着不解之缘, 如

故宫博物院被认为是集历史性建筑群与宫廷原有珍藏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也是利用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建筑而建立博物馆的一个范例。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问题, 多在研

讨论博物馆建筑和博物馆文化时有所提及^①。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力求相对全面地勾勒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之概貌并探讨相关问题，以期为深化相关研究抛砖引玉^②。

一、发展脉络

1. 清末时期

费约翰曾就博物馆之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意义有过精辟阐释：“在中国，从伦理的到进步的历史意识的转换，可以追溯到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逐渐取代（传统）园林这件事情上。”^[2]从西方式博物馆所带来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后，中国人开始在家乡自办博物馆，“地方上的博物馆长们争相控制通往同样的历史宝藏的门径，并试图为母体文明获取教会机构正为西方获取的东西”^[2]。清末维新和地方新政浪潮中诞生的国人自办之公共博物馆中，再生型博物馆亦占一席之地。1897年，湖南郴州学会以讨论“盛衰之源”“振兴中华”为号召，以“开民智”为手段，创办博物院，“借公所庙宇先行陈列中国土产，凡花卉、虫鱼，凡有可考察者，无不可入”，但存世不足一年即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夭折^[3]。1906年，山东留日学生徐树人等创设泰安博物馆，馆址设泰安岱庙门楼，以文化启蒙和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为宗旨，陈列动植矿物标本及天文、人体解剖展品，存世仅三年即被官方视为异端而遭取缔^[4]⁸⁰。1911年，云南图书博物馆依托昆明翠湖经正书院创设^[5]。清末再生型博物馆大多依托书院、祠庙等兴办，因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国人对于博物馆这一新鲜事物的陌生感，另一方面因这些设施“本身为传统社会民众聚集场所，具有公共空间形态，博物馆建设者希望借此有效降低形式上的冲突”^[6]。

2. 北京政府时期

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虽较欧美各国为落后，然在民国成立之初，“一时曾有勃发之象，尤其在北方平津各地，官厅与人民方面，已经渐渐注意及此”^[7]。北京政府作为民国前期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在重构中国国家形象和巩固自身执政合法性方面，亦将博物馆建设视为重要切入点之一。当局强调保存古物为“学者之忧而国家之责也”，“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8]。同时将博物馆建设上升到“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的政治高度^[9]。与此同时，妥善处置清室宫殿和传统祠庙，既是新旧嬗变题中应有之意，也事关做好走向共和的“下半篇文章”。再生型博物馆则为二者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结合点。清民鼎革之初，依托故宫外廷及午门门楼和国子监及孔庙，先后有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之设。值得注意的是，当局在此过程中颇为注重文化传承抑或“配型”，即将合适的古建筑再生利用为合适的博物馆，并非简单的“拉郎配”。以历史博物馆为例，其筹备处初设于国子监，因“国子监旧署，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古之资，实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10]。1918年，该馆迁入故宫端门、午门馆址。“考《明史·地理志》，永乐四年闰七月，建北京宫殿，是本馆馆舍已为六百年之建筑，是亦历史博物矣。”^[11]溥仪被逐出宫后第三天，北京政府即发布清室官禁充作博物馆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俟善后工作全部结束，即将官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12]故宫博物院对外开放

① 参见韩宝山《博物馆建筑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博物馆建筑设计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王成《博物馆建筑的演变与发展》，《中国博物馆》2001年第1期；孙琳《基于历史建筑再生的博物馆展陈空间设计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亦有学者在研究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和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博物馆建筑问题时曾对早期再生型博物馆做过回顾，参见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15年；徐玲《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1949—1966），《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6期。

② 本文涉及之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分布地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标志着这一进程达到高潮，奠定了故宫“一宫三馆”格局。傅振伦认为，依托故宫古建筑群创设之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始，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13]。民国学界则从理论层面对此予以肯定：“欧洲各国，喜利用旧日皇宫或其他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以为博物馆。我国之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亦即旧日宫殿。本来皇宫本身，论其艺术价值，即值得保存以供观赏，利用为博物馆，可谓一举两得。”^{[14]26}

彼时政府主管部门就再生型博物馆建设亦有所规划。1916年召开的全国教育行政会议通过《各地方孔庙附设社会教育机关办法咨询案》，明确各地孔庙“除大成殿、崇祠等，得由地方长官，酌量情形，就其中规设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教育成绩品陈列所、阅报社、讲演所等一项或数项。”“孔庙内原有古物、古迹，均应加意保存，毋任毁损。”“凡同城孔庙有两处以上，得并于一处致祭者，其余得改办社教。”^[15]相关省县对此亦有所响应。山东省益都县政府于1917年创设金石陈列室，馆址设于县文庙，藏品以金石书画居多^{[14]81}。山西省政府于1919年依托太原文庙设立圣庙教育图书博物馆，内设动物、植物、矿物、生理标本室，阅览室、藏书室、教育成绩及土产陈列室，古物陈列室，来宾接待室等，各殿廊陈列佛教造像十余身^[16]。

3. 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成立后，政学两界颇为重视古建筑再生利用问题，就依托古建筑创设公共文化机构开展了相应顶层设计和理论探讨。1928年，时任内政部长薛笃弼有感于民穷财困、建设资金匮乏，着眼资源挖潜、变废为宝，撰写《六废利用》一文加以鼓吹，其中指出：“钟鼓楼可利用作国耻纪念馆，其他大庙宇或公共房屋，可利用作教育馆、实业馆、

美术馆等”^[17]。1929年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之《孔庙财产保管办法》第五条规定：“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18]1929年8月，北平市社会局拟将太庙辟为市民公园，局长延毓祺接受采访时称：“拟就所有殿宇，分设国耻、艺术、教育三馆……添设国货陈列所，以提倡国货；设立博物陈列所，以广市民见物。”^[19]1930年以后，国民政府将无人管理古建筑特别是寺庙的管理使用权限下放地方。1930年1月11日，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示荒废寺庙之所有权和管理使用权问题；2月8日，立法院第75次会议通过荒废寺庙财产之处分及其用途解释，明确“荒废寺庙财产，地方自治团体自可按照《监督寺庙条例》为适当之处分”^[20]。在民国博物馆学语境中，凡具备陈列展览功能的公共文化机构皆被归入博物馆范畴^[21]。可见上述制度安排亦为再生型博物馆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环境与发展空间。相对于官方考虑古建筑再生利用问题时需要注意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学界更看重再生型博物馆之经济性对于促进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意义。“我国博物馆事业，方始萌芽。际此艰难时期，更无多余经费以兴建筑，而各地方旧时建筑，如庙宇等为数不少，宜选择商借，为博物馆暂时之用。”^{[14]26}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即为这样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例子，“查本市内越秀山镇海楼现经修葺，地方适合，拨为院址，不须另付建筑经费，诚一举而两善也。”^[22]

综观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再生型博物馆之创设范式，可分为以下数类：一是依托寺观祠庙创设。时人指出：“修改庙宇为公共场所，这也是很普遍的。如开封城中最繁盛的中山市场，即是以前相国寺的化身。内有种种小规模的娱乐地方及革命纪念馆、实业馆、美术馆、图书馆等。”^[23]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址系由王阳明祠、文

① 《监督寺庙条例》第四条规定：“荒废之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之。”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8页。

② 按照当时中国博物馆协会之定义，部分民众教育馆和美术馆、国货陈列馆、纪念馆甚至动（植）物园、水族馆等，皆可视为博物馆。

澜阁、忠烈祠、圣因寺罗汉堂合并而成，分别充作总务处、历史文化部、自然科学部和博物教材陈列室^[24]。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设于兰州市西大街庄严寺，其陈列部“搜罗各类古物暨文艺等件，陈列室中，供游人之展览”。据1936年统计，该馆收藏古物138种、字画碑帖59种，有书画研究室3间，展览陈列室13间^[25]。

二是依托衙署贡院等公产创设。洛阳河洛图书金石部依托原明福王府仪卫司旧址兴建，收藏北魏至宋历代墓志、碑刻、经幢、造像等百数十方，代表性展品有洛阳出土之三代铜器、汉唐古镜、六朝鎏金铜佛、唐三彩等百余件^[26]。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博物馆馆址设于济南贡院^[27]。

三是依托古代城池附属设施创设。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馆址设在北平前门箭楼^[28]。晋绥物产陈列馆设在太原鼓楼，第一层为机器工具，第二层为农村特产，第三层为手工业制品，时人称其“实为山西年来工业突飞进步之征”^[29]。

四是依托古建筑旧址创设。江苏吴县甬直镇保圣寺相传创于齐梁，中有唐代十八罗汉像，寺宇年久失修。1928年秋大殿又复倾圮，罗汉像五尊，幸先已他移，未致同毁。前殿尚完好，构架全系宋式。

“是为研究我国古建筑者之绝好参考材料，极有保存之价值”。遂于次年春由教育部组织保存甬直唐塑委员会，于1932年在大殿址建成古物馆^[30]。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都停办”。至1945年，全国博物馆仅余12座尚勉强维持^[31]。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刚有起色随即又无奈跌入低谷。但再生型博物馆在战时并未停止发展，大后方的新疆、四川、陕西三省先后有此类博物馆之创设。1940年3月，新疆省政府批准设立新疆古物陈列馆，并通令征集汉唐以来古物，馆址初设迪化红山北斗宫，1942年藏品移交新疆汉族文化促进总会，至1944年初达1436件^[32]。1941年，四川省政府创设四川博物馆，馆址设于成都皇城明远楼，开馆时有古物及历史民俗标本六千余件，其中十分之七系由国立四川大学博物馆筹备处移交^[33]。西安碑林近代以来长期由陕

西省立图书馆代管，1938年成立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1944年依托西安碑林创设陕西省历史博物馆^[34]^[310]。此后是否有再生型博物馆新设，目前尚无史料佐证。

二、规模考析

1. 数量统计

近代中国博物馆之数量统计与资料收集，有官方、行业协会、个人三方面来源，统计口径和认定标准亦不尽相同，互有重复或遗漏。据国民政府档案，1933年时国统区博物馆总数为17座^[35]。据中国博物馆协会1936年版《中国博物馆一览》统计数据，国统区博物馆数量为62座。据杨家骆编纂之《中国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一览表》，截至1936年秋，国统区博物馆数量为89座^[36]。上述文献皆附有各博物馆馆址及简介，为探讨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之规模提供了基础资料。此外，亦有部分前文提及之再生型博物馆为上述文献所未载。相互参详考证后，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再生型博物馆共39座。创设情况参见表1。

2. 分布考察

从空间分布考察，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遍及北京（北平）、南京、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安徽、湖南、云南、广东、甘肃、新疆、陕西17省市，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北京（北平）因古建筑众多而成为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最为密集之地（12座）。从发展阶段考察，除了清末和全面抗战时期（各3座）之外，其余33座再生型博物馆创设于1913至1934年期间。从博物馆类型考察，包括综合类博物馆5座、历史类博物馆21座、自然科学类博物馆5座、人文艺术类博物馆4座、国货（物产）陈列馆3座、革命纪念馆1座。从所赋存古建筑类型考察，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馆址涵盖了除石窟寺和古塔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建筑遗产领域（表2）。

表1 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一览

创设年份	名称	馆址	地区
1897	湖南郴州学会博物院	公所庙宇(不详)	湖南
1906	泰安博物馆	泰安岱庙门楼	山东
1911	云南图书博物馆	昆明翠湖经正书院	云南
1913	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	府右街25号旧式建筑	北京
1914	北平古物陈列所	故宫外廷	北京
1915	北平市卫生陈列所	中山公园内旧式宫殿	北京
1916	保定教育博物馆	保定城内古莲花池	河北
1917	益都县金石陈列室	县文庙	山东
1919	山西圣庙教育图书博物馆	太原文庙	山西
1921	安徽省立图书馆历史博物部	安庆藩署旧址	安徽
1922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门陈列室	松公府(大学士傅恒宅第)	北京
1925	故宫博物院	故宫内廷及大高殿、皇史宬、太庙、景山	北京
1926	北平历史博物馆	故宫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	北京
1926	东三省博物馆	沈阳故宫	辽宁
1927	苏州美术馆	吴县沧浪亭	江苏
1927	开封大相国寺博物馆	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等	河南
1928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陈列馆	古观象台明清旧建筑	北京
1928	首都国货陈列馆	清代江宁织造府旧址	南京
1928	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	正阳门箭楼	北京
1928	颐和园陈列馆	颐和园排云殿、芳辉殿、紫霄殿、仁寿殿、乐寿堂、玉澜堂等	北京
1928	兰州市立博物馆	兰州府文庙	甘肃
1929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王阳明祠、文澜阁、忠烈祠、圣因寺罗汉堂等	浙江
1929	广州市立博物院	越秀山镇海楼(1928年修缮)	广东
1929	江苏革命博物馆	南京瞻园(中山王徐达府邸)	南京
1929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博物馆	济南贡院	山东
1930	中国西部科学院附设公共博物馆	巴县北碚东岳庙	四川
1930	中国戏曲音乐院博物馆	中海怀仁堂后福禄居	北京
1931	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	中海怀仁堂、福昌殿、延庆殿	北京
1931	晋绥物产陈列馆	太原鼓楼	山西
1931	山西省襄陵县公立图书馆博物馆	县孔庙	山西

续表

创设年份	名称	馆址	地区
1932	徐沟县立博物馆	县孔庙	山西
1932	甬直保圣寺古物馆	甬直保圣寺遗址	江苏
1932	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陈列部	兰州市西大街庄严寺	甘肃
1932	洛阳河洛图书馆金石部	明福王府仪卫司旧址	河南
1934	北平国剧学会陈列馆	旧式四合院	北京
1934	中原社会教育馆	洛阳周公庙	河南
1940	新疆古物陈列馆	迪化红山北斗宫	新疆
1941	四川博物馆	成都皇城明远楼	四川
1944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西安碑林	陕西

资料来源：《中国博物馆一览》《中国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一览表》及前文所提及者。

表2 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赋存古建筑类型统计

赋存古建筑类型	宫殿	祠庙	衙署	寺观
数量 (座)	8	10	3	4
赋存古建筑类型	书院 (贡院)	园林 (碑林)	官邸与 民居	古代城市 设施
数量 (座)	2	4	5	3

3. 所占比重

通过数据对比，亦可看出再生型博物馆在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代中国博物馆数量在1936年时达到巅峰（77座）^[37]，其中包括全面抗战爆发前业已存在、采用新式建筑且自成体系的26座高校博物馆^[38]。其余51座公共博物馆中，再生型博物馆（34座，不含清末夭折之2座和全面抗战时期创设之3座）占66.7%，亦即再生型博物馆占近代中国公共博物馆巅峰期总量的三分之二。

三、价值蕴涵

再生型博物馆之价值蕴涵相较于近代中国其他

公共文化机构，呈现出若干独特之处。

1. 共和象征

如前统计，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中近半数馆址系宫殿和祠庙，二者分别为封建统治之世俗与精神象征，尤以帝都北京为集中。时人对于此类古建筑改为博物馆多有感慨。“清鼎既革，宫苑荒凉，旧时禁地，任人观览”^[39]；“向之，王公大人入紫禁城必步行。年届耄耋，始赏骑马。今则巍巍殿陛，可以徜徉，是亦共和之一征欤。”^[40]⁶⁴亦有学者指出此举反映了当局执政理念由封建思想到民本主义的转型，“北平宫阙与颐和园等各种建筑，均为世界大观，经政府相继开放，以与民共乐，皆一反昔日禁地森严之旧制矣。”^[41]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当天，“是日自晨至夕，游人拥挤不堪。次日清理参观路线捡拾妇孺手帕、鞋帽，凡四抬筐，实是博物馆界未有的盛况。”^[42]平民百姓以这种具有强烈仪式感的集体狂欢宣告了封建皇权神秘感的彻底破除。

2. 古建保护

中式古建筑因其木质材料特性导致难以长久保存。如梁思成所言：“中国建筑自有史以来就是以梁柱做骨干的，而这骨干的材料一向以木为主，木本

不是不朽的物质。”^[43]黄濬亦认为“吾国虽以旧邦著于世界，然大建筑物，除长城外，鲜能保全，殿宇廊舍，率用木材，故也”^[44]。经常性的保护修缮有助于保持古建筑良好状态，保养性岁修工程每三年左右一次，普通古建筑二三十年大修一次，故宫这样的宫殿建筑五十年大修一次^[45]。近代中国的古建筑维修频率显然难以达到类似标准，但对于再生型博物馆而言，其在收藏保护可移动文物的同时，为维持自身正常运行，客观上又必须承担所赋存古建筑的保护修缮责任，从而使相关古建筑除了战争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之外，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得以确保基本生存，个别还能益寿延年。总体而言，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所赋存古建筑之生存状态呈金字塔型。

处于金字塔塔尖的比较幸运的古建筑多系北平皇室宫殿园林，其养护与修缮相对常态化，如故宫宫殿繁多，地方辽阔，“如勾抹渗漏、粉饰油漆、添修窗户等岁修工程，每月均有……仅就财力所及酌量修缮”^[46]。抗战胜利后，包括部分再生型博物馆在内的古建筑修缮工作还被列入北平市政府政绩考

核体系^[47]。主要情况参见表3。

处于金字塔中部的少量再生型博物馆，能够得到基本的修缮与维护，有的还能产生额外社会增益，分三类言之：一类属于抢救性保护型。江苏甬直保圣寺因“殿宇倾覆壁像均渐圯坏，仅余东壁一堵罗汉像四尊，又先拆存之罗汉五尊及塑壁碎片若干”，国民政府教育部、江苏省政府及唐塑保存会同人“醮资议修复”并建古物馆。“古物馆房舍则全体不用木材藉防水火。塑像以外原建造之斗拱、柱础、石幢及碎甃零砖悉移置馆内外，以免毁灭。”1932年秋竣工，用款2.1万元^[48]。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滕固1935年考察西安碑林时，深感“此地虽在清乾隆中改筑，然屋宇敝旧，时有崩圯之虞。余与仲良周览建筑，归京后将提议改筑，以树一劳永逸之计”^[49]。1937年4月至1938年4月，国民政府及陕西省政府分别拨款，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全面整修^{[34]320-332}。一类属于维持基本运行型。如江苏革命博物馆馆址设于有金陵第一名园之称的瞻园，因原有园林建筑年久失修，曾进行过多次小型修缮^[50]。一类属于造福社区型。如洛阳周公

表3 北平部分再生型博物馆赋存古建筑保养修缮工程

实施时间	工程内容	所属机构
1935	内廷：神武门门洞、旧御史衙门、御花园、惠风亭北面台阶、中正殿遗基、东大门上顶修缮；大高殿前硃石门三座及东角门油饰。景山：万春亭、周赏亭、辑芳亭、富览亭、观妙亭修缮。太庙：门前井亭与后河宫门修缮，河墙修补	故宫博物院
1938—1942	庆寿堂、雨花阁、大高殿南面牌坊修缮，景山万春亭、观德殿、寿皇殿牌楼及瓦顶修缮，部分宫殿瓦顶修补	故宫博物院
	东西华门、武英殿、銮舆衙、弘义阁修缮	古物陈列所
	午门东、西朝房修缮，午门城墙修补	历史博物馆
	益寿堂、谐趣园修缮，长廊与乐寿堂油饰，荇桥牌楼重建	颐和园陈列馆
1946—1947	内廷宫殿保养	故宫博物院
	外廷三大殿及武英殿保养	古物陈列所
	建筑保养	颐和园陈列馆

资料来源：《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二十四年工作报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年，第12—13页；伪建设总署编印《建设总署工作报告》1939年1—9月、1943年6—8月各卷；《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概要》（三十五年度），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7年，第3—7页。

庙周边的范文正公祠、二程先生祠、邵康节祠等本来都已荒落不堪，沦为乞丐留宿所。自从周公庙改为中原社会教育馆以后，不仅自身获得修葺，而且连带“这一片祠屋都重加整理，预备将来开办民众学校”^[51]。

大多数再生型博物馆则处于金字塔底端，就笔者所见史料，尚未见明确之养护或修缮记载，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所赋存古建筑属于“屋坚强”。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类再生型博物馆对于古建筑保护的最大意义，是宣示了所赋存古建筑为有主之物，从而避免其因无人管理使用可能遭受的不当占用甚至破坏、拆毁之厄运。

3. 文化产业

有学者指出，不论庭院住宅、宫殿组群，还是佛院寺庙，中国传统建筑采取的是一种平面展开、线性逐层递进的设计图式，“人们可以在开阖有序而又曲折迂回的空间中来尽情地体会和欣赏建筑所内涵的审美情趣”^[52]。相对于采用钢筋水泥结构、内部空间相对封闭、参观路线相对固定的新式公共博物馆，依托古建筑创设之再生型博物馆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建筑遗产博物馆，其将博物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的广度与深度大为拓展，既为观众带来不同于普通博物馆之参观体验，又便于其拓展创收门路，使相关古建筑自身社会与经济效益得到一定发挥，而这都是新式博物馆所不具备的条件。北平古物陈列所作为知名文化旅游景点，一方面依托故宫建筑提供游客服务，“太和殿外廊下，有休息处，茶点西酒咸备。武英殿门首并有照片发售，游客可在此缮片付邮云”^{[40]63}。另一方面充分挖掘故宫文物历史文化价值，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开发销售文物拓片、文物明信片、文物照片、古籍书画复制品等初级文创产品73种。其中文物拓片代表产品如精拓周颂壶全形并文字（售价每张二十元），文物照片代表产品如历代名画尺二照片34种（根据相纸质量售价分为每张八角和一元二角两种），古籍书画复制品如珂罗版印元赵孟頫书金刚经（每册二元五角），明信片代表产品如珂罗版宫殿风景明

信片（每封十二页、售价三角）等^[53]。云南图书博物馆之所以选择翠湖经正书院为馆址，旨在“取其风景幽胜，眼界空明，屋宇清洁，光线充足”。因馆舍环境宜人，该馆还将馆内翠湖船亭一部分“随时租借各机关各界宴会”，租用一日者收费二元五角，半日者收费二元，为公益事项者可免租金^[54]。此举不仅可弥补日常经费不足，亦为昆明各界提供了新的社交场所或公共活动空间。西安碑林在近代曾为陕西省立图书馆、碑林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多个机构管理，字帖行入碑林拓碑历史悠久，已成地方传统行业甚至关乎民生。20世纪30年代初，西安碑林440余种2000余块全套拓片售洋八十五元，十三经碑拓片36506字售洋三十五元^[55]。作为再生型博物馆，西安碑林管理机构还承担着管理和规范民间拓碑行业的特殊职能，通过制定规则和收取费用等手段，既获取一定额外收入用于文物保护，又使拓碑这一传统文化产业得以存续、碑林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得以传播和弘扬^{[34]313-314, 347}。当然，事物皆有双面性，时人对文化产业之于再生型博物馆特别是其所赋存之古建筑的负面影响亦有诟病，如西安碑林“碑帖商每日派人捶击，自朝至暮无已时，自元旦至除夕无休日，受伤甚剧”^[56]。对文物古迹的过度开发利用时至今日亦是全球性症结，遑论近代中国。

四、内外症结

1. 自身短板

再生型博物馆之所以在近代中国博物馆史上长期存在并成为主流，最大优势在于其无需新建，为陈列展览提供了空间，筹备开放较为便捷。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古建筑为主要硬件的再生型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若干问题或争议。民国学界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再生型博物馆自身存在三大顽疾：一是陈列之物未必与建筑样式相调和；二是旧式建筑于光线、温度、湿度、储藏、看守诸问题，增加许多困难；三是古代建筑多用木料，为虫蚁寄生之所，毒气熏之，亦不能尽，设博物馆其



内，木类及纺织类标本，易遭损坏。故指出“旧式建筑，非不可用，但不宜用为永久陈列之所”^{[14]26}。

较为激进的观点则干脆予以否定。陈端志认为：

“在过去，博物馆每多附设于其他建筑中，均不妥善；征诸历来的经验，这种配置容易发生种种困难，并会妨碍到博物馆业务的进展。”^[57]费畦雨、费鸿年亦强调：“博物馆不宜与其他官厅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同建于一所，在经验上已证明其有害无益。”^[58]在实践中，学界的这种忧虑或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再生型博物馆所赋存之古建筑本身不是专门为博物馆量身打造，日常运行中必然存在弊端或矛盾。以馆舍环境控制为例，出于消防安全考虑，再生型博物馆内部一般没有新式博物馆标配的采暖或降温设备。据傅振伦回忆，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开馆后，因“双阙巍峨，殿宇高寒”，公开展览一个月后就暂行关闭^[59]。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设于北平前门箭楼，除春秋两季常规开放外，特别规定：“本馆馆址甚高，夏季极热、冬季极寒，既无风扇又不能安装火炉，看守生只有一班，且在此两季，游人尤少，故得将启闭时间依实际情形修改之。”^[60]部分再生型博物馆投入运行后，对相关古建筑进行改造以利展览布置，馆方意识到其并不特别适合长期保存和展示文物，因此多有添建西式或仿古房屋充当文物库房或附属设施之举，但往往两头不讨好。一派意见认为此举违背中国古建筑修缮“修旧如旧”理念，破坏了古建筑历史风貌。名园沧浪亭改为苏州美术馆和美术专门学校后添建二层西式楼房，“是园幸存，但学校仿西式屋宇，渐失旧韵”^[61]。一派意见认为此举纯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周肇祥于1927年8月接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之职后，发现新建之宝蕴楼“工减料薄”“楼内承柱中径仅六七寸……楼上板亦薄，两面过楼其下无柱。去年（1926）将堕坠，乃加柱支撑之……此楼之筑，转系官物，其他工料价至七万，而筑此不适用之物，可叹”。同时他指出“若以七万金建一铁筋混凝土之屋，水火地震永无损坏，胜此百倍矣。至可宝贵之磁玉雕刻品贮之危楼，一

旦覆压或地震则成齑粉矣”^{[62]61-62}。

2. 外部影响

难以有效抵御盗窃和火灾风险是古建筑的先天弱项。1932年6月17日夜，设于兰州庄严寺的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陈列部馆藏之定西出土新莽权衡被盗，丢失衡钩各一、大小圈三枚及篆文图样，后被天津海关查获^[63]。1945年冬，新疆古物陈列馆在迪化川云贵会馆之文物库房失火，因大殿为木构，火势蔓延极快，除少数金属质文物外，余皆焚毁^[32]。此外，再生型博物馆无法像新建博物馆那样主动或科学地选择馆址，只能被动适应所赋存古建筑周边环境，如古物陈列所就曾遇到过环境污染问题，“西华门外甬子河短墙内，有人盘踞设粪场，狼藉臭秽、行道掩鼻。遣人与区署交涉驱逐，不得要领。牒京师警察总厅飭办。一面添加河墙杜绝逾越，努力查察，庶可禁绝耳”^{[62]63}。

经费问题是制约再生型博物馆发展的瓶颈。如前文提及之广州市立博物院那样有经过修葺的现成古建筑可供入驻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再生型博物馆与所赋存古建筑“配型”之后，若欲谋求更好发展，必须对馆舍加以改造，所需费用远超所谓经济性的理想状态。当局往往只负责解决“配型”问题，除故宫等个别例外，对于二者“配型”后磨合程度和“幸福”与否放任自流。学界对此心知肚明，“如对旧式建筑内部进行改造，所费极巨，不亚于建一新馆”^{[14]27}。主管部门亦对于依托古建筑创设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所需之高昂费用持悲观态度：“开始的时候就因陋就简，将来要想发展也是很不容易。用一个旧的建筑物，维持修理的费用累积加起来，恐怕要比新的花钱更多。”^[64]这也导致一些酝酿中的再生型博物馆夭折，如松江民众教育馆“初拟利用岳庙太虚亭房屋为馆舍，盖以其地处商市中心，与民众易于接近也；后以该处房屋坍塌过甚，修筑需费颇巨，乃改用县立图书馆腾出之房屋”^[65]。泰安岱庙庙址“本甚宏大，惜年代久远，殿宇多已毁圮，颓垣残柱，修葺久疏”，泰安民众教育馆由各地搜集铜铁及石雕神像大小数十尊，原

拟借岱庙以作古物陈列，“大约因经济关系，故无甚成绩表现”^[66]。

3. 停滞原因

全面抗战胜利后无新设再生型博物馆之原因，亦可从内外两方面简析。

就内部因素而言，战后学界关于博物馆建筑之理念发生重大变化，认为再生型博物馆已不适应现代博物馆功能需要。

以前办博物馆的人，很喜欢利用伟大的皇宫和神庙来做博物馆的馆舍，不错！那伟大的皇宫和神庙，他本身建筑的宏丽，便是一件绝好的陈列品，从美观的一点来说，实在很有资格做博物馆的馆舍了。可是，因为现代博物馆学发展的结果，博物馆馆舍需和博物馆的事业相配合，皇宫和神庙就不一定与博物馆的业务相配合。^[67]

亦有学者指出，中式传统建筑风格已不适应二次大战后世界公共建筑潮流。“现代建筑标准早已趋向钢铁水泥，而建筑物内部布置，亦日益讲求集中紧凑的平面且有时需要多层的高度……旧式一层正厢走廊天井多进的平面布置，显然太散漫而不方便。”^[68]再生型博物馆在近代中国之创设，本身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然而战后学界同样秉持实用主义态度，其风向趋于与国际接轨，认为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不仅要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陈列品，还必须要与有与之相配的现代化馆舍，依托古建筑创设之再生型博物馆则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历史遗迹。

就外部因素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古建筑蒙受惨重损失。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完成《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共计741处文物古迹战时受损或灭失^[69]。皮之不存，毛亦难附，抗战胜利后，除受时局变化影响导致博物馆建设停滞外，更重要的是，再生型博物馆失去了古建筑这一安身立命的物质载体，至少在战后较难再找到合适之“配型”。

五、结语

清末国人自办之再生型博物馆，多昙花一现，仅云南图书博物馆在民国存续。1927年前创设之再生型博物馆多集中于北京、河北、山东等当局尚能有效控制区域。国民政府建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再生型博物馆迎来较大发展。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仍有再生型博物馆创设个案。抗战胜利后，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未见再生型博物馆新设之记载。被学界视为权宜之计的再生型博物馆，其发展史绵延近半个世纪，尽管质量参差不齐，加之不可抗力经常中断其发展进程，导致部分再生型博物馆发展乏力、难以为继甚至中道废止，但其毕竟是近代中国公共博物馆的主流和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朱维铮如是阐释外来思想文化之本土化：

然而思想文化或学术的历史进程，从来不与政治史同步，也不是“外因”论可以解释的。它体现着中国文明传统的内在变异过程，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没有经过学者文士的消化吸收，绝难融入传统而化作新传统。因此，对现存传统的怀疑、批判与背叛，对已逝传统的怀念、发掘与复活，反而成为融解外来思想文化而促使传统变异的必要前提和经常形式。^[70]

这段话同样适用解释再生型博物馆于近代中国存在的意义。博物馆作为一种物化的外来文明象征，欲在中国落地生根，不仅需要知识界的引进与传播，同样需要借助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体使之融入本土生活。依托古建筑创设之再生型博物馆就是这样的载体，凭借自身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消化吸收博物馆这一舶来品，使之融入近代中国社会而化为新的社会风尚，逐渐成为影响普通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必要前提和经常形式之一。时人对于文化领域的全盘西化趋势亦曾颇有微词：“连了所谓古董古物，也要一般西化专家用了西洋方法来保存，始得久留。”^[71]而再生型博物馆的存在与发展，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抵制全盘西化趋势的思潮。抛开经济性方面的实用主义考量，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

馆不仅体现了东西方文明的包容与共存,而且在维护文化道统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努力进行调适或中和,同时暗合了近似“中学为体”(以古建筑为馆舍)、“西学为用”(引入博物馆形态)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屏蔽和过滤了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潮对于近代中国博物馆以至文物保护事业的掣肘,走出了一条在馆舍形态、陈列展览、内部管理以至政治寓意、社会价值等方面都与外国博物馆有所不同的中式博物馆发展之路。

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文物建筑开放导则》,明确提出文物价值、建筑特征、空间规模等各方面具备条件的古建筑,可作为博物馆、展示馆、美术馆或科研场所等,进行文物建筑现状展示或进行陈列布展,发挥文化传播、科研和教育功能。近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将博物馆建在古建筑里”成为文物活化利用的主流之一。近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之建设经验与成败得失,对于当代中国再生型博物馆的再度兴起与发展亦有借鉴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项隆元. 近代形态博物馆的诞生与博物馆建筑类型的形成[J]. 北方文物, 2008(3): 112.
- [2] 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 李恭忠, 李里峰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76-78.
- [3] 侯良. 回眸与前瞻: 再谈湖南博物馆事业[C]//回顾与展望: 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67-76.
- [4] 张广存, 焦德森. 1949年前山东博物馆发展概况[C]//回顾与展望: 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77-83.
- [5] 云南图书博物馆一览[M]. 云南图书博物馆, 1923: “纪事” 1.
- [6] 徐玲. 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66.
- [7] 陈端志. 博物馆学通论[M]. 上海: 上海市博物馆, 1936: 29.
- [8] 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1912年10月1日), 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所章程保存古物协进会章程令(1913年12月24日)[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68.
- [9] 教育总长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1914年6月28日)[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74.
- [10] 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75.
- [11] 中华民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概略(1925年)[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78.
- [12] 大总统发布清宫官禁充作博物馆令(1924年11月7日)[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293.
- [13] 傅振伦. 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始[M]//七十年所见所闻.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4.
- [14] 曾昭燏, 李济. 博物馆[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3.
- [15] 各地方孔庙附设教育机关办法咨案[M]//邵爽秋等. 历届教育会议议决案汇编. 上海: 教育编译馆, 1936: 7-8.
- [16] 陈万里. 西行日记[M]. 北京: 朴社, 1926: 3-4.
- [17] 薛笃弼. 六废利用[M]. 南京: 国民政府内政部, 1928: 4-8.
- [18] 孔庙财产保管办法(1929年6月)[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549.
- [19] 延毓祺对市民公园之意见[N]. 华北日报, 1929-8-17(6).
- [20] 荒废寺庙财产之处分及其用途解释文[M]//立法专刊第3辑. 南京: 立法院秘书处, 1931: 184.
- [21] 中国博物馆协会. 中国博物馆一览[M]. 中国博物馆协会, 1936.
- [22] 本院创立提案书[M]//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成立概况. 广州: 天成印务局, 1929: 21.
- [23] 以义. 河南的见闻[J]. 现代评论, 1928, 7(176): 18.
- [24]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参观指南[M]. 杭州: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1934: 1.
- [25] 甘肃教育概览[M]. 兰州: 甘肃省教育厅编审委员会, 1936: 67.
- [26] 李健人. 洛阳古今谈[M]. 洛阳: 史学研究所, 1936: 242-243.
- [27]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M]. 济南: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 1933: 3.
- [28] 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一览[M]. 北平: 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编查股, 1933: 22.

- [29] 王仰清, 许映湖. 邵元冲日记: 1935年7月28日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30] 甬直保圣寺保护问题[M]//内政年鉴.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81.
- [31]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M]. 南京: 中国文化事业公司, 1948: 329.
- [32] 许力. 新疆古物陈列馆兴衰记[J]. 新疆地方志, 1994(3): 59.
- [33] 冯汉骥. 四川博物馆概况, 四川省社会教育实施[M]. 成都: 四川省教育厅, 1942:21.
- [34] 路远. 西安碑林史[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1998.
- [35] 各省市博物馆概况一览表(1933年)[M]//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606-608.
- [36] 杨家骆. 中国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一览表[M]. 南京: 中国辞典馆, 1936.
- [37]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全国社会教育机关数: 表228[M]//中华民国统计年鉴. 南京: 中国文化事业公司, 1948: 330.
- [38] 史勇. 民国高校博物馆探要[J]. 博物院, 2020(5): 69-80.
- [39] 贡少芹, 周运辅, 吴之之, 等. 近五十年见闻录: 卷二[M]. 上海: 进步书局, 1930: 15.
- [40] 庄俞. 京华游览记[M]//张英. 本国新游记第1集.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 [41] 陈植. 造园学概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30.
- [42] 傅振伦. 故宫博物院[M]//七十年所见所闻.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0.
- [43] 梁思成. 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2, 3(1): 75-114.
- [44] 黄濬. 花随人圣庵摭忆[M]. 北平: 国立华北编译馆, 1943: 6.
- [45] 马炳坚. 谈谈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修缮[C]//张复合. 建筑史 2003: 第一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192.
- [46]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二十四年工作报告[M]. 北平: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6: 12.
- [47] 北平市政府政绩比较表[M]. 北平: 北平市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 1946.
- [48] 叶恭绰. 重装甬直保圣寺唐代塑像记[M]//遐庵汇稿. 遐庵汇稿年谱再版印行会, 1946: 360-361.
- [49] 滕固. 征途访古述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49.
- [50] 魏星, 刘东华. 鲜为人知的民国时期江苏革命博物馆[J]. 档案与建设, 2019(8): 90.
- [51] 倪锡英. 洛阳[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9: 47.
- [52] 刘月. 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88.
- [53] 古物陈列所出品价目[M]//古物陈列所游览指南. 北平: 古物陈列所, 1932.
- [54] 云南图书馆章程, 云南图书馆租借船亭暂定规约[M]//云南图书馆一览: 规章. 昆明: 云南图书馆, 1923: 1, 30-31.
- [55] 顾执中. 西行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30.
- [56] 王桐龄. 陕西旅行记[M]. 北京: 文化学社, 1928: 35.
- [57] 陈端志. 博物馆学通论[M]. 上海: 上海市博物馆, 1936: 217.
- [58] 费畦雨, 费鸿年. 博物馆学概论[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195.
- [59] 傅振伦. 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史略[M]//七十年所见所闻.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0.
- [60] 本馆游览规则[M]//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一览. 北平: 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编查股, 1933: 22.
- [61] 童寯. 园论[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12.
- [62] 周肇祥. 古物陈列所记略[J]. 国学丛刊, 1941(4).
- [63]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甘肃省志·文化志[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7: 509-510.
- [64]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 普通图书馆设备举要[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5.
- [65] 松江民众教育馆概况[M]. 松江民众教育馆概况编辑委员会, 1933: 1.
- [66] 贺伯辛. 八省旅行见闻录[M]. 上海: 开明书店, 1935: 141.
- [67] 蒋大沂. 博物馆的“馆”[N]. 中央日报, 1946-10-23(10).
- [68] 童寯. 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M]//公共工程专刊: 第1集. 南京: 国民政府内政部, 1945: 30.
- [69] 孟国祥. 大劫难: 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60.
- [70] 朱维铮. 维新旧梦已成烟: 戊戌“百日维新”的前一百年[M]//中华文史论丛: 第58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7.
- [71] 陈序经. 全盘西化论[C]//陈序经文集.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44.